

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王晶雄 王善平 著

SHEHUI FAZHAN :FANSI YU CHAOYUE

MAKESI ZHUYI SHEHUI FAZHAN LILUN YANJIU

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王晶雄 王善平 著

SHEHUI FAZHAN :FANSI YU CHAOYUE
MAKESI ZHUYI SHEHUI FAZHAN LILUN YANJI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晶雄,王善平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80730 - 648 - 1

I. 社… II. ①王… ②王… III.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IV. 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846 号

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作 者	王晶雄 王善平
责任编辑	李西曦 乐惟清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11088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3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648 - 1/D · 32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当思想的闪电击中神州大地	1
第一章 社会存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范式	8
一、抽象存在论:旧发展观的哲学范式	9
二、社会存在论:新发展观的存在论根基	16
三、实践决定论:社会发展的决定论依据	23
第二章 整体发展: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30
一、社会有机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	31
二、全面生产:社会整体发展的根本所在	34
三、整体发展:超越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表现	43
第三章 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	51
一、以人为本:唯物史观如是说	51
二、以人为本: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58
三、走出误区:正确把握以人为本的基本条件	64
第四章 社会交往:不可遗忘的发展维度	73
一、“交往”范畴的当代定位	74
二、“交往”与“发展”的当代互动	83
三、交往:透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视角	91

第五章 自在与自为：社会发展的双重维度	101
一、社会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101
二、社会发展：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108
三、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119
第六章 东方社会：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	127
一、东方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聚焦点	128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之谜	132
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留下的宝贵遗产	151
第七章 探索与创新：列宁晚期的沉思	156
一、列宁晚期思想：不可遗忘的政治遗产	156
二、艰难的探索：列宁晚期思想的轨迹	160
三、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列宁晚期思想的核心	167
四、深远的启迪：列宁晚期思想的当代意义	184
第八章 现代性批判：现代社会发展之深层反思	191
一、二次大战与奥斯威辛：现代性批判之动因	192
二、现代性之本质：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神圣同盟	200
三、扬弃资本统治：现代性批判之出路	207
第九章 发展的代价：可以承受之重	212
一、代价意识：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213
二、发展代价：社会发展的内在环节	219
三、社会发展：代价调控的艺术	225
第十章 经济现象学：透视社会发展本质的基本路径	233
一、经济现象学：经济哲学的学理传统	234
二、社会经济存在论：经济哲学的理论范式	239
三、财富公共化：经济现象学视野下的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246
四、夯实财富的伦理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251

结语 任重道远的探索之路	259
一、由“合法性辩护”转向“合理性辩护”	259
二、从“封闭式研究”转向“开放式研究”	262
三、由“文本本位”转向“实践本位”	265
[附录一] 回顾与展望: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268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82

导
论

当
思
想
的
神
州
大
闪
电
击
中
地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①

——马克思

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②

——马克思

无关大众痛痒的学术，乃是不痛不痒的学术；

无关人类死活的思想，定是不死不活的思想。

在学术界自我划“界”、独立成“圈”的今天，学术越来越只关乎学者生计而无关乎大众生存，学术走出学术圈、思想走出思想圈亦日益成为一个大难题。一方面，学术圈呈现了空前的自给自足性，从学术课题的颁布、选择、研究，到课题经费的拨付，直至课题的评审、结项、发表、出版，已经形成一条高度专业化的流水线，学术大可不必走出学术圈了。另一方面，在课题制的牵引下，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抽象化、定向化、标准化、程式化，日益远离普通大众的感性生存，逐渐成为某种无关民众死活和痛痒的东西，故它已经很难走出学术圈。否则，一旦走出学术圈，反而难免落入备受讥嘲、自取其辱的境地。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马克思曾经引用的英国老牌哲学家休谟的名言：

“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①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此语来形容处境危殆的近代哲学。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而且对奠基于其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而言，这仍然是一句最能概括其尴尬处境的名言。一方面，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拥有“本应被到处承认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作为毫不实用的“抽象理论”，它又像“被控背叛臣民的国王”，在诸种实用科学的群起围剿之下，它被迫在每个场合为其生存的合法性作辩护。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母体，其研究者也大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班人马。问题在于，在追求“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经济学等实用科学独霸天下，批判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则备受冷落，且动辄被冠以“不合时宜”或“空洞无用”之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之类的批判性理论研究而言，往昔的显学之荣耀一去不复返，曾经的话语霸权亦已荡然无存，甚至连最基本的饭碗生计皆成问题。

因此，我们不得不自我追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何为？它应当如何重建其话语权与影响力？

当然，若仅仅为了稻粱谋，凭借其主流意识形态之余威与国家力量之扶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虽然无法重温显学旧梦，但定当还能长期固守一些虽有所萎缩但还算大致稳固的传统地盘。如果仅仅为了生存之计，吾等亦不妨做一些“哲学智慧与市场经济”之类的商业化探索，或者干脆另择新枝、另辟捷径。但是，如果跳出饭碗危机的狭隘眼界，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者当深思两个深层问题：其一，包括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内，既往的理论研究的自身困境何在？其二，值此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境遇，当下理论研究当如何革新以回应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

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①可见，马克思之所以一生痛恨“理论家”、“哲学家”之类的头衔，在于他及早地洞察了传统理论研究的困境：自我满足于逻辑上的自洽一致、完整严密、精致完美，而无法解决“现实生活的任务”，无力切中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困境。正如马克思等人一再指明的，传统理论之病根在于以理论剪裁历史的“理念中心论”，甚至包括近代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哲学——在内，也完全继承了漠视人类感性生存的理论本位主义——“理念拜物教”——的衣钵。因此，马克思强烈反对将其社会发展理论冠以“历史哲学”的名号，公开申明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为此，马克思一再公然呼吁彻底“消灭哲学”，因为“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③

显然，正因为洞悉了旧哲学之漠视人类感性生存的宗教本质，马克思丝毫不留恋哲学的话语霸权，相反，早在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等“哲学终结者”宣判哲学死刑之前，马克思已经自觉提出并肩负起了“消灭哲学”的使命——创立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正如马克思本人严正声明的，其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14页。

物史观绝非以逻辑剪裁历史的“历史哲学”，而是始终以当代人的感性生存为本位、致力于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科学”，它不满足于为异化了的人类提供精神麻醉剂，而是直接致力于消除人的异化。在“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存在着“以抽象理论为本位”和“以人的感性生存为本位”的原则差别，前者致力于逻辑一致性而不惜以逻辑剪裁历史，乃至完全漠视人类普遍异化之现实；后者则致力于每个“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扬弃人的异化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鉴于历史一再上演“哲学畸变为宗教”的悲剧，马克思坚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①

可见，生存还是死亡？解放还是统治？自由还是奴役？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这规定了其社会发展理论“在特定人类生存语境中，尤其是资本全球化语境中探讨人类解放之路”的发展哲学特质。在拯救与逍遥之间，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选择了拯救，它厌弃了传统理论之逍遥优游的气质，而切近于“解放与拯救”这一急迫的生存论主题。“人的感性生存”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不是闲暇阶层对知识的惊奇，而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是苦难者对生死存亡的深度关切。因此，它总是从特定的人类生存语境出发，探讨为能动的实践所改变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此，马克思申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

综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何曾有过离开人类社会发展语境的抽象哲学话语？一如“思想的闪电击中沉睡的大地”，马克思主义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

中了当代问题的核心——资本全球化，作为当之无愧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倾听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轰鸣和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在马克思逝世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仍大有必要高举“消灭哲学、扬弃资本、解放人类”的大旗，它既不妄图重建哲学的话语霸权，也不妄想重现昔日显学之荣耀，而是要重开其“经由资本批判而思入当代人类命运”的生存论研究路向。唯有如此，它才不至辜负其肩负的解放使命，才能触及当代发展的实质，深入思考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

众所周知，资本全球化乃是一切现代问题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必须正确面对的中心课题。虽然，中国是完全被动地卷入资本全球化浪潮的，因而现代性危机并不是内生于中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相反，由于资本全球化始终遵循“中心—边缘”殖民模式，资本输出国在回输利润之余总是将更多的现代性灾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身处边缘的中国不仅分享了现代性更少更短的阳光与幸福，而且更多更久地分担了它带来的黑暗与灾难，而身处现代性之中心的欧美则与此相反。

当然，也不能因此轻易得出悲观的结论：中国更无望防范现代性的危机。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惨痛、难堪、挣扎、摸索、期待之后，中国也终于投入现代性的怀抱，我们因此领略了现代性的灿烂阳光，也因此经受了现代性的风风雨雨。那么，现代性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呢？现代性能否无限度地容纳中国呢？现代性的本质来历及其历史走向如何？现代性崩溃可能带来何种后果？现代性采取何种发展模式？作为关心中国人存在的思想者，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者怎能不追问这些问题呢？！事实上，无论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依赖，还是人口老化、教育改革、农村经济，深度卷进现代性的中国已经遭遇各种现代病。因此，除非出于深度的近视或高度的冷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已无法不思及“当代中国人的存在”问题。



现代性虽然内生于欧美国家，但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强大扩张力量，它很快就确立了其在全球的汪洋大海般的统治。因此，即使中国人也无法不遭遇现代性难题。但是，由于承载着五千年的东方文明，由于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传统课题，国人将难免遭遇更多尴尬、繁难、意外，切近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存在因此成为比深入把握现代性更为深广的课题。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彷徨与挫折之后，13亿中国人正快速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显然，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力的事件，它不仅极大地加速现代性的扩张，而且很可能极快加速现代性的终结，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就是最好的明证。因此，就现代性的未来发展而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深入把握现代性之发展趋势与最终结局的前提，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当代发展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大课题。

鉴于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先发展——后发展”之时空差别，作为现代性的后起之秀，19世纪时的德国之境遇与当代中国之境遇颇有相似之处。对于19世纪德国“既苦于资本之发展，又苦于资本之不发展”的尴尬处境，无论是康德、歌德，还是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很多精妙论述。为此，我们不妨将德国作为解剖现代性的标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彷徨、痛苦、抗争、罪恶、激情之后，德国最终仍然无可避免地被纳入了现代性的怀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最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德国的关注，他将当时的德国比喻为“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憔悴的偶像崇拜者”，并预言“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境地”。^①当然，这一预言无可置疑地失验了，但是，正如病愈不能证明医生误诊一样，马克思预言的失验反证了现代性的顽强生命力。为此，我们不妨鹦鹉学舌：中国是“感染了现代性病症的传统国家”，并因此可能“在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前就面临现代性崩溃的境地”，一如“感染了富贵病的穷人”将提前遭遇困顿一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①马克思曾经这样评判当时的德国人，并如此寄语当时的理论研究者：“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②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够更加切近当代中国人的感性生存，我们也不妨套用马克思的话并寄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者：

“思想的闪电只有彻底击中素朴的神州大地，中国人才会解放成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哲会马社会学发克会范展思存式理主在论义论的社：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马克思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马克思

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关键不在于具体细微的观点创新，而在于其哲学范式的创新。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内，任何一种社会发展观的理论完备性与实践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存在论根基和哲学范式。在姿彩各异、多元竞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长盛不衰，从根本上来说，乃在于其所立足的全新的存在论根基——社会存在论。正是因为凭借了此一马克思所完成的存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才得以抛弃“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统哲学范式，开创了“立足社会实践、从社会存在出发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哲学范式。唯有如此，理性之光才得以照亮黑暗混沌的历史档案馆，思想的闪电才能击中充满了主体性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才能在日益为当代实践所改变的全球化时代中突显出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一、抽象存在论：旧发展观的哲学范式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在马克思的所有文本之中，这可以说是最具有标志性和纲领性的名言之一，其影响力甚至不亚于曾经引起了全球大震动的战斗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句名言都共同标示出，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不是辩护性、解释性的，或者干脆说，它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战斗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绝不是保守性的，而是革命性的；它不是面向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的；它不满足于解释既有的世界，而是要彻底改变现存世界；它不是粉饰现存统治秩序的理论花样，而是直接诉诸革命实践的行动纲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这不仅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理论立场，而且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并因此而导致了两种有着原则差异的哲学范式和社会发展理论：一种是立足于抽象存在论范式的理念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另一种是立足于社会存在论范式的实践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

作为西方正统哲学范式——抽象存在论范式——的总源头，以柏拉图之《理想国》为经典的古希腊哲学开创了“理念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它以理念为本位、从抽象存在出发去思辨演绎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恶果必然是以逻辑剪裁历史、以理念压迫实践。这其中最为登峰造极的典型，乃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演示的“神学目的论”的社会发展观，它虽然已经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方式、规模、进程、目的、代价等方面作了相当系统的分析，但无一不是在人类的感性实践之外进行的“神学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绎”，故在其中充斥的是神的主体性，却毫无半点人类的主体性可言，其所谓的社会历史发展不过是由“世俗之城”向“上帝之城”进发的“上帝计划”。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理念决定论”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典型，就是黑格尔老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展示的世界精神论的社会发展观，它虽然脱却了基督教神学的外套，而以标志人类理性之自由自觉的“世界精神”统帅人类社会发展史，整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因而被大肆标榜为实现理性自由的进步史。但是，黑格尔所谓的世界精神是抽象、超个人、无人身的，包括拿破仑式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在内，任何现实的个人都只能沦为“理性狡计”的工具，社会发展史绝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外化。可见，黑格尔不过是以“世界精神”偷换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不过是以“抽象预设的理性目的论”替换了“神秘预设的神学目的论”，其“理性史观”不过是奥古斯丁之“神性史观”的粗糙翻版。

总之，因为鄙弃并远离了现实个人之感性而能动的生存实践，包括柏拉图、奥古斯丁、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在内，甚至包括晚近期的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文明决定论者”在内，一切以“理念”、“精神”、“理性”、“文化”等为本位的社会发展理论，都注定要么只是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解释世界，要么只是臆想以“震撼世界”的词句来“改变”世界。在同一本质上，它们其实只是改变了对世界的解释，而毫无能力去改变世界本身。具体而言，西方一以贯之的“理念决定论”的社会发展观蕴含了四个异常顽固的学理信念，它们互相交织渗透，形成了四条脉络清晰的学理传统，从而基本规定了马克思之前的旧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范式和整体框架：

第一，“绝对存在”的信念，它不仅催生了“存在—现象”二分的本质主义思维框架和一脉相传的本体论传统，而且导致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外在决定论”传统，也即马克思一再痛批的黑格尔式的“神正论”传统。这是因为，它总是先验抽象出一个形上绝对、永恒普泛、自在自为的，集主体、实体、本体于一身的，充当着第一范畴、第一原理、第一推力的“存在”，并由此出发思辨演绎出

作为现象界的整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如此一来，“存在”本体不仅成为认识的主要对象，而且被先验地设定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高主体和最高力量，人作为真正的实践主体和力量源泉反而从一开始就被虚无化、边缘化、工具化了。

当然，不同思想家对存在本体的具体规定亦各有不同，柏拉图的“逻各斯”、阿奎那的“上帝”、霍布斯的“物质”、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权力意志”等都不过是存在本体的不同表达。但严格地说来，它们只是名相概念上的差别，而绝无地位、性质、功能上的差别，其思维框架始终如出一辙，其理论套路与终局亦大同小异。因此，毫无例外地，由于设想实践之外、超时间、非历史、自在自为的“绝对存在”，由于总是妄图在人类的能动实践之外寻找社会发展之路，理念本体论传统的必然结局只能是导致神秘化的“神正论”。为此，作为西方正统哲学之最为深入、系统、激烈的批判者，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将“存在”存在者化的形而上学做法的恶劣后果，不仅在于它抹杀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而且在于它完全遮蔽了存在的意义和现实个人此在在世的世界现象，从而也先行堵塞了个人此在的自由解放之路。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将整部西方哲学史称之为“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史，一部令人走向无家可归的虚无主义史，故为了使当代人类走出无家可归状态，大有“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①当然，正如德里达所批评的，海德格尔在妄图拯救“存在”以期为个人“此在”开辟未来发展之路的同时，已经先行置身于抽象的“存在论话语传统”中，故很难在重新探明人类发展之路方面有所大作为。

第二，“纯粹主体”和“纯粹知识”的信念，它不仅催生了割裂认知主客体的辩证历史关系、以抽象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而且在确立“意识的优先性”的同时剥夺了“实践的优先性”，社会发展之路因而要么变得扑朔迷离，要么走上南辕北辙的歧途。正如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已经辩明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第3页。